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成果丛书

童兵 / 主编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

最新报告 (2013)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成果丛书

童 兵 / 主编

张 华 黄文杰 徐玲英 / 副主编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 最新报告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13)/童兵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7-309-10127-0

I. 中… II. 童… III. 新闻学-传播学-研究报告-中国-2013 IV. 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0714 号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13)

童 兵 主编

责任编辑/李 婷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16 印张 29.5 字数 694 千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127-0/G · 1246

定价: 5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屈指算来,自2006年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985基地)成立,编撰出版《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以来,本报告(2013)是第八部,其主题是梳理和评介2012年全国特别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学研究的概况和成果,即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及主要观点,出版的著作、教材和译作,全国召开的同新闻传播活动及产业相关的学术会议。编撰本报告的一贯宗旨是:向人们鸟瞰式地展示过去一年中国(以大陆地区高校为主)新闻传播学科学研究全貌,代表性学术观点,以及研究者和编撰人对它们的评介。同时,作为985国家创新基地的主要学术成果之一,这部报告也是向国家和复旦大学985管理机构提交的一份工作报告。

2012年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聚集的热点议题有:

- (1)“未来新闻学”的提出与走势;
- (2)“全球新闻观念”的研究;
- (3)新媒体对传统新闻业和新闻学的影响;
- (4)新闻学学科反思意识的增强态势研究;
- (5)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研究;
- (6)新媒体环境下传播学理论的新发展;
- (7)新传播技术与社会变革研究;
- (8)舆论学理论及实务研究。

对本年度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整体情况的分析表明,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核心理论框架的缺失是个大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这些年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放松,二是学风浮躁和功利心态的侵害,三是组织学术团队攻关等努力不足。其实,基础理论研究着力不够,标志性成果产出不多这一问题,从编撰第一部最新报告时已经指出,可惜有关方面视而不见,或者抓而不紧。我们愿在这里再次呼吁,期待在新的一年里有新的改善,有新的起色。

同上一年度报告一样,除对上述聚集的热点议题作较为详细的梳理分析,总报告不再对全部作者及其论文的代表性观点作概括性介绍,相关内容请读者分别从二、三、四、五、六部分的分类报告中检索和查找。

我们的学术挚友张晓锋教授仍然担任2012年学术会议和出版社有关新闻传播学著作教材等出版概况的整理及撰写工作。感谢他,并通过他向其所在的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表达我们由衷的谢忱。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2级全体博士研究生和部分博士后同学为本年度报告的研究、撰写和出版投入了半年时间的紧张而有效的劳动。班长张华不仅承担了书稿组织工作,由于人手不够,还同赵琼

等同学每人撰写了两部分报告。留学生朴由敬和台湾学生洪芳琪、黄裕峰克服对中国或大陆学术界情况不甚了解等困难,完成了自己分工的部分。作为主编,除了向同学们表示感谢之外,相信对每位同学来说,集体参与编撰工作本身也是一种有效的学习,从文稿的撰写到贯彻编书的规范,每个人都会有所收益。

仍应继续感谢一如既往地支持编撰这部最新报告的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和复旦大学出版社诸位领导和朋友。

同前七部最新报告付梓时刻的心态一样,交出第八部书稿,作为主编的我内心仍十分不安。我国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和高校学报太多,每年发表的论文太多,涉及的作者太多,尽管一再要求同学们对当年发表的相关论文要进行“地毯式扫描”,仍难以避免疏漏少数学者的重要论文,对论文观点的提炼也未必精当。如果出现此类情况,则由我本人负主要责任,向这些作者表示歉意。

欢迎广大读者,尤其是相关学者、专家提出宝贵的批评和指正。

童 兵

2013年8月12日于复旦大学“985”基地

目 录

前言.....	童 兵 1
---------	-------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报告(2013)	2
---------------------------	---

第二部分 新闻学研究

新闻学理论研究	24
中国新闻史研究	40
外国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研究	54
新闻传播实务研究	70
舆论学理论、方法与实务研究	89
突发公共事件与群体性事件新闻报道研究	109
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研究	123
新闻教育研究	139

第三部分 传播学研究

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	154
受众与传播效果研究	173
公共传播与人际传播研究	192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202
广告研究	215
公共关系研究	233
媒介文化研究	245
文化产业研究	261

第四部分 互联网与新媒体研究

新媒体理论与实务研究	280
网络舆论的形成与引导研究	292

中国移动互联网研究	312
-----------------	-----

第五部分 视听传播、媒介经营管理与改革研究

电视研究	324
电影研究	340
广播电视主持人研究	355
新闻摄影研究	366
报业经营管理研究	377
党报改革与创新研究	388
广电传媒体制研究	401
编辑出版理论与实务研究	424

第六部分 台湾省新闻传播学研究

台湾省新闻传播学研究	448
------------------	-----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报告(2013)

2012年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继续活跃,不断深入。参加编撰本年度报告的20余位博士生和博士后在研人员,共查阅新闻学、传播学及其属下的三级学科网络传播、视听传播、编辑发行等研究论文14 000多篇。这一年重要的学术会议举行了60余次。有更多的出版社参与新闻传播学的选题,出版了数量依然可观的专著、教材和译著。

一、学术研究关注的热点

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显学,不断有新话题涌现,作为学科前沿的一些分支学科和重点课题在每个年度都有新的内容和新的深度。在2012年,新闻学中的“未来新闻学”、“全球新闻观念”,传播学中的新媒体环境、移动互联网新特征等都成为本年度聚集力最强的、为众多高校师生关注的重要学术话题。

1. “未来新闻学”

作为新闻学研究者和业界对不断变化中的媒介生态和传播模式作出的回应,“未来新闻学”提供的理念、思路和理论框架是围绕“全球、全民、全媒”当前新闻传播发展的三个总趋势展开和生发的^①。它的研究者将新闻学的未来寄望于互联网和受众参与,它的研究具有五种“全科”取向:社会学取向探究的是新闻现在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历史学取向探究的是新闻过去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符号学取向探究的是新闻是如何借助语言和视觉符号发挥作用的;政治学取向探究的是新闻应当如何发挥作用;文化研究取向探究的是新闻是如何发挥其不同作用的^②。

2. “全球新闻观念”

2012年新闻学研究中,对“全球新闻观念”的研究是个值得关注的热点。其关注的是全球新闻传播业共同面临的新闻理论问题,比如人类关于新闻统一性的看法,并非西方特别是美国一家的新闻观念。这种关于新闻统一性的观念不仅仅是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流行,更多的是各种新闻观念对话交流的结果。全球新闻观念形成的可能,在于全球新闻业的统一性,或者组织、结构、功能、目标等的大致相似性。一旦共同的新闻观念形成,即可逐步形成惯性的国际新闻传播规范或原则^③。

全球新闻观念对于中国的对外传播具有现实意义。随着新闻生产走向“全球化”,即从采集、编

① 参见史安斌、李彬:《回归“人民性”与“公共性”——全球传播视野下的“走基层”报道浅析》,《新闻记者》2012年第8期。

② 参见史安斌:《全球·全民·全媒:国际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的路径与前景——以新闻传播大变局中清华大学国际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为例》,《新闻界》2012年第10期。

③ 参见杨保军:《全球性新闻观念形成的可能、实质与机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4期。

写、流通到接受等环节逐渐“去疆界化”,随着中国选择主动融入这一全球新闻传播的“话语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教学和科研应当紧紧围绕媒体和文化全球化的主题进行调整和变革。从概念和理论的层面上看,传统的“国际传播”应被更符合现实的“全球传播”所代替。从实践的层面来看,信奉“内外有别”原则的“外宣”也应升级为更具想象力、更符合新闻传播规律和生态的“对外传播”、“公共外交”、“国家品牌行销”等^①。

3. 新媒体对传统新闻业和新闻学的影响

2012年有不少学者继续探讨新媒体对传统新闻业的冲击和影响。有学者指出,社会化媒体的勃兴和媒介融合的大趋势,是当前传媒业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具体而言,这些问题包括:社会化媒体对专业媒体的包围和冲击;媒介融合对专业媒体的挑战和洗礼;媒介融合时代的合与分的辩证思考;对媒介融合的终极目标的深刻把握^②。而在新闻生产方面,问题有:互联网对新闻源、文本形态、反馈与民意、社会影响力等的影响,由严格把关控制、高成本的、专业化和组织化的生产方式逐步转向社会化生产。而普通网民作为新闻发布者和传播者而生产的新闻或“草根”新闻形态,也在日益推动整个新闻生产向社会化发展^③。新技术和社会化媒体、移动终端和大数据等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在于:社会化媒体开启了“用户为中心”的时代,新闻生产模式将是公民新闻与专业媒体平分秋色;新闻消费模式则是个人门户兴起而大众门户式微;移动传播重新定义新闻生产与消费的时空观;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成为新闻“富矿”,成为新闻的核心资源之一^④。

有学者认为,新闻传播学面临着新兴媒体的五方面挑战:第一,新兴媒体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分离的,是“去政治化”、商业化的,其立场和价值观也是多元的。传统新闻学的“性质说”,遇到了新兴媒体的挑战。第二,新媒体工作者是社会信息的私人发布者,已经不能用传统新闻学对传媒和传媒人的角色认定来描述他们的身份了,传媒人的社会角色改变了。第三,对新闻信息的价值认定,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有着极大的不同。对个人化、碎片化的信息传递的价值教化功能和规范,对新兴媒体运作中的某些反主流价值观的行为如何监管和调整,是传统新闻学中没有涉及的。第四,新兴媒体对于新闻选择的必要性、重要性、正当性的认定和把握,主要依据功利和兴趣这两个因素,同传统新闻学是不同的。第五,善用媒体人的角色,做到传统媒体人始终把普利策对于新闻记者的使命的理解看作新闻职业的圭臬这一点是不容易的^⑤。

又有学者指出,新媒体技术给新闻带来了一种新的尺度,解构了新闻的本体。以传统认识论“本质主义”的立场观之,这种解构必然造成新闻的终结,因为新闻的本体是新闻的生命。以后现代解释学“反本质主义”的立场观之,这种解构不会造成新闻的终结,仅仅会造成新闻的转向,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不存在新闻的本体。而后现代解释学的立场更符合新媒体语境,因此当今的新闻不是在走向

① 参见史安斌:《全球·全民·全媒:国际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的路径与前景——以新闻传播大变局中清华大学国际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为例》,《新闻界》2012年第10期。

② 参见彭兰:《社会化媒体与媒介融合的双重挑战》,《新闻界》2012年第1期。

③ 参见张志安:《互联网如何影响我国新闻业》,《传媒》2012年第12期。

④ 参见彭兰:《社会化媒体、移动终端、大数据:影响新闻生产的新技术因素》,《新闻界》2012年第16期。

⑤ 参见童兵:《新媒体传播对传统新闻学的挑战》,《新闻界》2012年第10期。

终结,而是正在发生一次重大的转向^①。

4. 新闻学学科反思意识的增强态势研究

2012年的新闻学研究中,不少学者认为,在新媒体环境中,现有的新闻学理论范式,在报道理念、思维方式、信息量、报道深度等方面,均存在不足,探求科学提升新闻媒体引导力的有效理论路径成为当务之急。其中,功能主义路径的新闻学研究成为当年被学者集中反思的对象。有学者指出,在功能主义视域下,由于现代社会规模早已超出人们身体在场的时空,必须依靠一种东西来维系基本的联络。新闻传媒的功能就在于此,它是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工具,公共意见交流的平台,整合“脱域”化社会的重要机制。要使这一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媒介必须摆脱各种社会力量的控制。但媒体真的能摆脱各种社会力量的控制吗?以这样的出发点推论出来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②。

有学者指出,一直以有组织的职业化新闻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新闻学,其理论路径基本按照“新闻活动——新闻事业——新闻工作”展开。这一研究路径很难将新媒介的传播现象和规律纳入其中,这就需以变革的眼光来看待新媒介环境下的新闻学,回归“新闻”和“传播”本身,构建新的理论体系。这种变革的第一步,是对新闻学的核心概念——“媒体”从根本上重新界定。媒体之所以成为“媒体”,关键在于影响力,而不在于是否组织化。自媒体是个人超脱组织而自成媒体,是个人化的媒体形式。因此,新媒介环境下新闻学基本理论中的媒体概念应该从“作为组织、职业的新闻业”扩展到“作为影响力主体的使用媒介的组织及个人”^③。

5. 纪念施拉姆访华 30 周年研究

2012年是传播学奠基人韦尔伯·施拉姆访问中国大陆30周年。《新闻与传播研究》组织了一期纪念施拉姆访华学术之旅的专辑,探讨当代中国传播学研究现状,展望发展走向。作为施拉姆的学生,余也鲁教授回顾了施拉姆访华的学术、社会背景,访问细节以及那次“破冰之旅”对中国传播学研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陈崇山对施拉姆的理论在中国受众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进行了梳理。另一位年轻学者将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历程归为“三次大潮”:施拉姆访华前已由不同渠道进入中国的传播学成果所导致的新闻界的“暗潮汹涌”;施拉姆“破冰之旅”带来的“波涛滚滚”;港台及海外华裔传播学者再次登陆带来的多维度的“惊涛拍岸”。他同时也有反思,沿袭施拉姆的传播学理论,中国的传播学理论引进与本土化研究基本围绕传播与国家及社会发展的主线展开,使传播学丧失了人文视域。他认为,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有自己独立的思维路径和对真问题的研究^④。

6. 新媒体环境下传播学理论的新发展

在对传播学理论的整体考察中,有学者认为传统的传播效果理论无法完全解读微博传播实践,经

① 参见蒋晓丽、张聘:《新闻的终结?新闻的转向?——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宿命》,《新闻界》2012年第18期。

② 参见芮必峰:《新闻学研究中功能主义倾向和方法之思考——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例》,《新闻大学》2012年第2期。

③ 参见芮必峰、陈明惠:《新媒介环境下扩展了的“媒体”范畴——兼谈传统新闻学的调整与变革》,《新闻界》2012年第14期。

④ 参见余也鲁、施清斌、崔煜芳、章琪琦:《中国传播学研究破冰之旅的回顾——余也鲁教授访问记》;陈崇山:《施拉姆的理论对我的指引》;姜飞:《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研究》,均见《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典大众传播理论对微博传播实践发生作用的解读也应有所不同。比如,在微博传播中,“把关人”角色发生变化,其效应也被削弱;议程设置功能则以一种比较软性和潜在的方式存在;微博弱化了“沉默的螺旋”的心理机制,但并没有完全消除这种心理;“使用与满足”理论对微博发生作用的有限性最少,有效性则最大^①。

有学者提出,“主动议程设置”观点有悖议程设置本意。议程设置作为一种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它叙述的是新闻自由条件下媒体无意中影响公众议程的一种传播功能,它应该是一种客观的传播效果。传媒主观地按照统一的要求来设置传媒的议程,有意地放大或缩小、遮蔽某些社会公认的重要议程,这就存在着引导舆论的伦理问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了解民意和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合理、合法的程序,以讨论的方式来引导舆论走向理性^②。还有学者讨论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间的议程设置,分析议程融合和融合新闻等具体表现形式,认为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体间议程设置具有产生、扩散网络谣言和虚假新闻的负面效应^③。有些学者通过定量实验的方法对受众在不同媒介信息获取渠道中产生的属性议程设置进行探讨,对议程融合假设作了一些修正,指出在议程融合过程中,个体为了满足和渴望加入群体的认知上的和谐而采取的信息接触方式,是与其渴望加入群体的规模有一定关系的^④。还有学者从属性议程设置和铺垫效应两个新的研究维度出发,将议程设置理论的领域扩展到受众对议题的态度评价以及态度改变层面^⑤。

“意见领袖”是本年度学者们关注的又一个研究重点。有学者认为,意见领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互联网上的辩论伦理和交往伦理,尤其是在网上可否推行有效的对话,在微博快速化、碎片化和直接化的特点影响下,合格的意见领袖应该是有可能形成身份认同的、有一技之长的、人品良好的社会倾听者^⑥。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微博意见领袖的行动活性受到外部、内部以及技术三个层面不确定性的制约,具有机会主义策略、事件导向和“极化”趋向的行动特征,其多重不确定性交互影响,形成“乘数”效应,更加剧了微博空间的不确定性^⑦。

在“沉默的螺旋”理论研究方面,有学者将视野转向媒介化社会的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代沟”,引进沉默螺旋和绝对优势理论,提炼出一个“螺旋悖反”的受众选择模型,并延伸到信源、信息、反馈、环境等要素,认为当媒介化社会成为发展趋势,实体世界和虚拟世界的鸿沟正在被克服,这是一种技术先导、受众驱动、媒介跟进的自发组织过程^⑧。

7. 新传播技术与社会变革研究

本年度不少学者以新传播技术与社会变革为主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这方面的内容包括:新传播技术与我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交往;新传播技术背景下我国受众的媒介使用及意见表达;博

① 参见田维钢、付晓光:《大众传播理论在微博环境下的有限性和有效性》,《现代传播》2012年第3期。

② 参见陈力丹:《“主动议程设置”有悖议程设置本意》,《新闻记者》2012年第7期。

③ 参见石义彬、冯强:《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体间议程设置效果检视》,《新闻传播》2012年第3期。

④ 参见马志浩等:《群体规模对属性议程设置的影响——基于议程融合假设的实验研究》,《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4期。

⑤ 参见蒋忠波:《论议程设置研究的两个新维度》,《新闻爱好者》2012年8月(下半月)。

⑥ 参见胡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络意见领袖》,《新闻记者》2012年第9期。

⑦ 参见张涛甫:《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的行动特征——基于对其行动空间多重不确定性的分析》,《新闻记者》2012年第9期。

⑧ 参见顾明毅:《螺旋悖反:媒介化社会的二元抉择》,《当代传播》2012年第3期。

客、微博与社会舆论的形成;新传播技术环境下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新传播技术与新社区和新农村建设;新传播技术与文化产业等。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密切关注传播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交往革命能够推动生产的发展和文明的传播,现代的交往具有更大的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特殊功能。在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换频繁的商品社会,交往手段的特殊功能适应了资本扩张的本性,使整个世界流动起来。从他们关于这场革命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用时间消灭空间是现代交往手段给现代物质与精神交往带来的革命性现实,并且呈现着一种无限发展的趋势^①。

在传播技术与权利的关系层面,有学者指出技术革命给人类信息传播关系的权利结构带来的影响,指出传播权带来比言论自由、通讯自由、出版自由更全面、更开放、更能体现人权价值的权利框架。传播权是人的个体与集体依法自由参与互动传播活动,公平、合理“近用”传播媒介资源并享受信息利益的权利,作为一项综合性的基本人权,国家负有尊重、实现与保障传播权的义务。传播权是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秩序的统一,体现了权利的规范化构想。倡导自由、公平、包容、参与、规范的传播权,有利于推动中国信息传播法制的建设^②。

还有学者以传播信道演进的历史轨迹为主线,批判地运用麦克卢汉主义的唯技术史观分析人类传播活动的时空辩证关系,梳理三种传播形式和媒介形态的演变历程,指出随着媒介技术进化而来的传播信道,始终处于人类传播活动的核心地位,在媒介技术进化的过程中既暗含着不断演变的媒介时空辩证关系,又意味着传播和媒介的含义逐渐被狭义化的必然之势^③。

8. 舆论学理论及实务研究

由于近年关于舆论引导、舆论监督、民意调查、社情民意的讨论升温,舆论学理论研究也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本年度以“舆论”为篇名关键词的文献有1073篇之多,研究的内容包括:舆论的基本概念、舆论学研究方法、舆论的主体、舆论的生成、舆论场、舆论导向、舆论引导、舆论监督、舆论公共领域与政治传播、舆论与谣言、社会化媒体与舆论、舆情管理、社会阶层与民间表达、国际舆论等。

由于舆论学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许多研究是从舆论的概念界定开始的。有学者认为,西方舆论观存在着两条演化脉络:一条是科学主义路线,强调更有效的管理和对民主舆论更强有力的控制;一条是人本主义路线,把舆论看作是公共领域内平等民主的争论过程。其实,这两条路线均在分享一个共同的哲学传统和基础,即它们均根植于启蒙运动理智与理性的原理之中。第一条路线要求遵循专家的科学理性主义和肯定社会体制的合理性;第二条路线要求个体公民的理性和批判力。从启蒙运动到李普曼,西方舆论观发生了一个深刻的转向,即由倡导意见的自由广场转向对公民舆论的管理与调和^④。

有学者从公共舆论和民主政治关系的角度分析公共舆论的内涵和功能,指出,公共舆论由三方面的层次构成:公共舆论的主体是公众,公共舆论是公众对公共领域中产生的公共事务的观点、价值判

① 参见陈力丹:《“用时间消灭空间”——马克思恩格斯传播技术思想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5期。

② 参见张永忠:《信息社会的传播权——基于传播关系构造变动的理论思考》,《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3期。

③ 参见李曦等:《传播之“路”上的媒介进化与媒介形态演变》,《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1期。

④ 参见李欣人:《西方舆论观演化的现代性理论》,《山东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2期。

断和意志倾向的汇聚和集合,公共舆论利用大众传媒来组织和展示。公共舆论在民主政治发展中承载两个基本的功能:其一是汇聚和表达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其二是监督和制约公共政策的制定^①。

在“舆论动力学”的研究中,有人认为,舆论动力学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面向:一方面是研究影响舆论形成的个人层级的因素,如年龄、性别、信仰、种族、阶层、教育程度、经济状况以及情感、态度、心理需要等;另一方面是研究影响舆论形成的宏观社会层级的因素,涉及有哪些外部力量引发和推动舆论的形成,如舆论场对于舆论形成的影响。

二、2012 年新闻传播学术会议

2012 年全国高校新闻传播学术界丰收的一年,这一年主要学术会议共 60 余次,简要介绍如下。

1 月 3 日至 4 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共 6 所高校的新闻传播教学科研机构联合主办的第十一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语境下的舆论监督和媒体法制”。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凤凰周刊》、《财经》杂志、《中国青年报》、《经济观察报》、《新京报》等国内著名媒体和国内著名高校的新闻传播教学科研机构共 320 余人围绕“科学发展观”与新闻舆论监督、新闻舆论监督与协商民主和公平正义等进行了研讨。

1 月 6 日至 7 日,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举办“新媒体与新公共领域:转型时代的新闻业和新闻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马来西亚沙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等国内外高校新闻传播研究者及两岸三地新媒体领域的著名学者、资深从业者,就公共领域条件下的新闻和新媒体的问题展开了交流和探讨。

1 月 12 日,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和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联合主办的“公共媒体的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两国媒体精英、新闻传播学者就公共新闻、记者的角色和责任以及公共媒体与娱乐节目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

2 月 23 日,中国新闻史学会、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纪念邓拓百年诞辰座谈会”在北京举行。邓拓的老同事、老战友、亲属以及来自高校新闻院系的学者和首都新闻界代表近 60 人汇聚一堂,共同纪念和缅怀人民新闻家邓拓对中国新闻事业作出的贡献。

3 月 10 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承办的全国新闻传播教育高层联席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以及国内部分新闻学院院长,就新形势下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课题进行了交流。

3 月 18 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中国新闻社和网秦移动公司主办的“移动互联时代的传播创新”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互联网移动通信领域的教育研究、产业管理和企业界的专业人士约 100 人齐聚论坛,就移动互联时代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传播环境,进行传播创新,提高中国对外传播力等

^① 参见王彩波、丁建彪:《浅析公共舆论的内涵和功能》,《江苏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 期。

议题展开跨界互动交流。

3月31日至4月1日,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传媒学院联合举办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微博事件(2011—2012)”工作坊在上海举行。会议选取2011年至2012年发生的10大代表性个案,在梳理上述事件在微博表达中来龙去脉的基础上,检视各派网络思潮寻求真相和事实、观点表达与立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各派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各自影响社会行动或网络公共争论的规律、步骤与解决路径的方式,由此探究微博与中国的社会行动或网络公共争论之间的关系,以及背后更为宏大的文化政治、思想争斗与社会分化、转型等议题。

3月31日,中国新闻史学会与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如何研究新闻史?怎样办好《新闻春秋》?”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多位在京常务理事、特邀理事,以及来自首都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30余名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研讨会。

4月14日,《甘惜分文集》(三卷本)出版暨庆贺甘惜分教授96岁华诞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首都部分高校的专家学者和甘惜分的博士生等就其新闻理论教学与科研的贡献等进行了交流。

4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举办“微电影与企业精神传播”主题研讨会,来自十余家学术机构、企业单位和政府部门的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就微电影的属性、特点和传播规律进行探讨,探索借助微电影传播公司品牌的可行性及有效渠道。

4月26日至27日,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与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合作召开第三届新闻与媒体研究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围绕“中国记者和传媒的专业主义”的主题,探讨大众传媒和中国记者的职业化历程,探究其新闻生产方式、职业观念的变迁,考察媒介多元化背景下从业者的生存心态、自我反思以及行动策略与逻辑,研究新闻从业者、媒介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从中国社会政治生态和新闻场域的情境中把握中国记者和大众传媒。

4月27日至29日,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承办的第八届中国网络科学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关注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网络,以“科学与艺术的和谐统一”为主题,就“网络科学与社会化网络”、“微媒体、微传播、微动力”、“网络分析达人秀”等议题,着重探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新媒体时代下的融合与发展。

5月8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商务印书馆、《英才》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主流文化与文化之争”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文化产业界、学术界的代表,共同探讨了国际文化竞争格局,为中国文化如何成为世界主流出谋划策。

5月12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会等主办的“全媒体时代国际新闻传播教育创新论坛”在北京召开。60余位来自海内外学术界和媒体业界的高层负责人和知名专家学者与会,就国际新闻传播教育中的“全球模式”与“本土经验”、理论素养与实践技能培养之间的融合与对接,以及“新闻传播教育如何适应传媒数字化、产业化发展”、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界如何利用提升国际传播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难得机遇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5月12日至13日,教育部新闻传播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承办的“全国传播学本科教育联席会议”在安徽合肥举行。会议就“新媒体时代中国传播学本科教学及其发展对策”进

行专题报告,与会者共同探讨传播学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实验室建设和人才培养等问题。

5月23日,第五届全球传播论坛暨国际传播学会2012年度大会专题论坛“中国新媒体传播与互联网社区”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凤凰城)举办。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20所院校,以及美国、英国、丹麦、日本、新加坡等国的13所海外院校的嘉宾与代表就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诸如日常生活、政治生态、跨文化交流、弱势群体境况、传统媒体转型、研究与教育改革等展开讨论。

5月26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世界汉语修辞学会主办的新闻传播伦理与法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者围绕“全球化语境下的国家传播秩序建构与新国家文化建设:伦理与法制视阈”的主题展开研讨。

5月26日至27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和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八届“中俄大众传媒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俄两国30多家新闻院校、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80余位新闻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国际关系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信息化、全球化与国家形象,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传播,信息化社会与健康传播,新媒体与危机管理,社交媒体与政府公关,政治传播与社会参与,人际传播与社会共识,生态危机与环境传播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6月1日至3日,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研究院与《当代电影》杂志社在杭州召开了“国家形象的影像建构与传播”国际高峰论坛,主题是关于推动有关国家形象的影像建构与传播的理论研究,深化电影人对于电影和国家形象的认识,提升通过电影塑造国家形象的文化自觉与责任感。

6月2日至3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主办、“文化繁荣与新媒体发展”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复旦大学)联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承办的“2012传播变革与中国传播学教育和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与会者对中国传播学教育与研究的十年进行了回顾与展望,探讨了中国传播学研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及传播变革中本专业师资队伍与学术人才队伍的建设和教育问题。

6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台湾世新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传播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围绕着“新闻传播学的目的、路径与问题”的主题,来自两岸四地的30余位专家学者从新闻人才培养、传媒工作实务、新闻传播史、新闻传播理论等角度展开了深入研讨。

6月9日至10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联合主办的“开放·融合·责任:数字媒体与传播”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办。来自英国、加拿大、美国、西班牙、埃及、波兰及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学者,就数字化时代媒介的生存与发展、新型传播秩序的建立等问题展开了交流。

6月14日至16日,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POP)负责主办,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FMORC)、台湾政治大学等参与合办的世界舆论研究学会(WAPOR)第65届年会在香港举行,这是WAPOR第一次在亚洲举行年会。

6月15日至17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和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媒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世界舞台上的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举行。近百名来自世界各国的

学者就中国文化实力在世界舞台的发展前景及目前中国政府“走出去”的政策,以及中国文化在国际领域传播所遇到的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7月2日,由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传播学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席联合主办的“性别传播与社会发展”2012中加国际学术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加拿大、美国、英国、芬兰、坦桑尼亚等国的26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70多位学者参与论坛,围绕主题“性别传播与社会发展”,就新的历史社会条件中性别平等的理论内涵、性别范畴与阶层范畴的复杂关联、本土语境下女性主义的再思考、科学传播中的女性受众、战争报道与性别等诸多内容进行了交流。

7月2日至4日,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学术月刊》杂志社承办的“传播视野下的中国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美国、荷兰、日本、韩国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高校的30余名学者围绕中国研究在传播学视野下的转向与深化展开讨论。

7月5日,中国传媒大学媒体法规政策研究中心、北京法院知识产权保护实践基地联合主办的“冲突与共赢——著作权法修改与利益平衡”研讨会在北京举办。来自政府相关部门、法律实务界、传媒业界、互联网领域、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0多位代表围绕本次著作权法修改和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7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主办的媒介传播视野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近20家媒体的名编辑、记者和学者就“企业社会责任传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7月22日,中国传播学会、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等联合主办的2012年中国传播学年会暨“城市·文化·沟通”中国传播学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全国40余所高校的80余位专家学者就“意见表达、社区交往与影像再现:中国城市传播研究组织”、“PM2.5事件为对象的城市环境讨论”、“城市媒介形象研究”、“城市传播与城市文化”、“城市形象与城市营销”、“城市传播理论与实践”等议题展开讨论。

8月18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新闻史论青年论坛”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来自两岸和新加坡新闻传播学界、高校新闻院系、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60余名学者分享了新闻史论研究领域的探索发现、理论思考与阶段性成果。

8月18日,安徽大学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主办、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协办的第四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安徽合肥举行,近30名专家学者就新闻传播史领域的相关议题进行了讨论。

8月19日至21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年会暨“媒介文化与国际传播”国际学术论坛在江苏南京举行。海内外60余位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围绕“媒介文化与国际传播”这一会议主题,就对外传播与本土叙事、媒介形态与国际传播、媒介与文化传播实践、中外媒介文化等分论题展开了讨论。

8月22日至24日,台湾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公关与广告国际学术论坛在台北举行。来自美国、中国大陆、